探索·实践·展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文集

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 编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

TANSUO
SHIJIAN
ZHANWA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探索·实践·展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文集

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 编

TANSUO SHIJIAN ZHANWA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实践·展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文集 / 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219-10302-9

Ⅰ.①探… Ⅱ.①广… ②广… Ⅲ.①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文集 Ⅳ.①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2338号

责任编辑　严　颖　罗　雯
责任校对　雷翘铭　叶　婵
装帧设计　子　浩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65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　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10302-9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委员会

主　　编：梁培林

副 主 编：靳晓斌

成　　员：钟　洁　黎伟盛　邓双霜

吴晓霞　周　宇

前　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宏大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整体形成，经历了长期思考和探索，是一个不断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与《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汇集出版，旨在宏观上将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予以总体认识和系统把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研究提升到新的层次和水平。

本文集收入文章35篇，共36.5万字，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部分内容。全书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写作视角多元。既有历史维度，又有现实维度；既有哲学维度，又有实践维度；既有政治维度，又有文化维度。多视野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整体内涵。二是问题意识强烈。文章并不仅仅止于理论，还延伸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这些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成果，能为后来者的理论创新拓展更大的空间。三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收入的文章写

作时间跨度比较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理论创新的发展轨迹，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从“科学发展”到“共享发展”等，我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史的表述，力求准确反映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步伐，以促进不断变化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深入发展。这本文集的作者，大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如杨金海、谭培文、韩振峰、曾德盛等，他们文章的创见，思路清晰，言之有物，相信能给读者以启迪。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时代也在不断向前演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课题也将会不断深化。由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限，并受到学术眼光的局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还请读者指正。

目　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002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上）　…… 韩振峰
009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下）　…… 韩振峰
015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　…… 任晓伟
024　从历史维度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王海
032　人的解放理论视角下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　…… 蔡卫华，谭培文
04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化维度　…… 杨金海
051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性　…… 曾德盛
060　全面把握深入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　…… 杨金海
074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推进　…… 本志红
08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条件的把握与创建
——以延安时期为例　…… 李振印
095　党的一大到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刘国彬，余涛
105　群众观视角下“四个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 黎育生，汤志华
114　习近平执政理念探微　…… 丁威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124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层次和构建质料 …… 孟宪平
13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在互动中前进 …… 姜建芳
138 科学发展观对现代性与乌托邦超越的历史分析 …… 董四代
146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若干问题探析 …… 刘先春，杨志超，吴阳松
154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演变、现实动力与未来挑战 …… 张伟
162 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时代化 …… 苗瑞丹
172 科学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刘国章，陈则辉
18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中的“时代化” …… 陈蕙，韦日平
196 论马克思主义人本党建观的中国实践和发展 …… 韩昌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08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经验研究 …… 张春莹，平章起
216　认知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 …… 黄航
224　资政育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社会职能 …… 张晓明
2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施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发展 …… 梁培林
238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日常生活维度研究 …… 黄刚
246　和谐社会视阈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 …… 陆攀
254　文化哲学思维路径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 李春会，钟延强
262　论思维方式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张治银
271　中国共产党生态观大众化的演进脉络 …… 焦金波
28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举措研究报告
…… 杨金海，韦文英，张治银，刘长军
302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四个着力点 …… 马小芳
312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方式建构 …… 肖唤元，秦龙
320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 曾庆桃，张世飞

探索·实践·展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文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上）[①]

韩振峰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80多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认真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继续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①　本文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8期。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人，也是最早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2]的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此，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理论方面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首先，毛泽东最早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党和国家就开始面临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时期。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形势要求，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在这一报告中，他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3]《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此后，他又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谈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例如，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

义，要求反对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5]。

其次，从哲学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为了排除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毛泽东以哲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哲学论证。在《实践论》中，他系统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总结出其固有的规律。在《矛盾论》中，他强调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正是因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能如此迅速地被全党接受，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再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等。毛泽东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从实践方面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牢固的工农联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首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确立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然后开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者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新课题。对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昂首挺胸站了起来。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

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局限，虽然毛泽东的有些观点还不尽全面和系统，有些正确的思想和观点也未能一以贯之，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他已经初步涉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怎么走？这是以邓小平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历史选择和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并作出了初步回答，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理论方面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首先，系统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6]这是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哲学阐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通过矛盾的特殊性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性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真理。邓小平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他还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理的认识，明确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其次，坚持并捍卫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建立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例如，在毛泽东辞世以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受到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严重挑战和威胁。“左”的威胁主要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8]为了克服“两个凡是”的影响，邓小平要求重新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9]。针对来自右的威胁，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邓小平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0]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潮，邓小平领导全党坚决给予了回击，捍卫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

作用，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

再次，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认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招致挫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实践方面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首先，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曲折的原因。我国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经济发展缓慢，“文革”十年又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这种状况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未来进行严肃的思考。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对历史与现实、时代与国情作了全面考察，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全方位改革的历史性转变，由此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其次，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不断改革的社会，但是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体制僵化，缺乏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受到较为严重的制约。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的这一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文革”结束后，在我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政治勇气，提出实行全面改革。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1]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

会主义制度焕发出蓬勃生机。

再次，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突破了长期以来在经济体制上“左”的观念束缚，使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国初期，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我国逐步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这种体制的弊端便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系列科学论断，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8.

[2]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534.

[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374.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8-259.

[7] [11]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3，370，373.

[8] [9] [10]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190，391，236.